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

曾小霞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

◆ 曾小霞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 / 曾小霞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7

ISBN 978-7-5100-6761-7

I. ①史… II. ①曾… III. ①《史记》-叙述学-研究②《汉书》-叙述学-研究 IV. ①K204.2②K2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2603 号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 刘文辉 王梦洁

封面设计 谷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长沙市开福区山君彩印厂

规 格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6761-7/I·027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引言

一、史传叙事

中国古代文学一向以抒情文学为主,在漫长的文学史中,诗词歌赋曲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叙事文学不发达,至于最初的原因,王锺陵先生从文明发展中神话特征的角度对此作了精确的分析,他说:

在荒莽的动物神身上,世俗生活内容难以渗入;神系狭隘、神职贫乏模糊,则难以发生横向的交织关系;因而,大大限制了中国神话中故事性因素的发展。……由于神际关系的贫乏,他们的本质规定性大多并不丰富……当巨大的神话意象世界终于解体以后,它留存在先秦典籍中的大都是吉光片羽式的碎片,可以睿哲思、助议论,却难以推动叙事性文学的阔大构建。因而,中国叙事文学的长足发展还有待于来日。^①

先生以相当诗意的语言分析了中国早期神话中叙事因素的贫乏及其深层次原因,认为是神际关系的贫乏导致它们难以发生横向的交织关系,因而限制了故事性因素的发展,这一说切中肯綮。中国的神话不像西方神话那样有体系,而是呈现出零散性、片段性的特征,即使是神话宝库《山海经》,其叙事也是片段的,是吉光片羽式的碎片,此书虽然记录了很多神灵,但是这些神灵分占山头,各自为政,并不隶属于一个系统,也没有西方那种像宙斯一样的主神统帅这些散兵游勇。袁珂说《山海经》中大都只有神的存在而无神话,他认为此书故事情节完整的神话“实在并不多见。检核起来,不过是七八段罢了”^②。再加上中国早期

^①王锺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②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的实用理性观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等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神话没有得到系统梳理和二度创作,而是停留在原生神话的状态。鲁迅曾引用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说法解释中国神话不发达的原因:“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悬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①一方面是地理条件导致中国人务实的性格,另一方面是儒家中的实用思想遏制了神话的流传和发展,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后世人们对神话的解读往往从实用理性出发,注重神话中“神”的真实存在,如郭璞云:“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因诞迂夸,多奇怪侷偻之言,莫不疑焉。”^②过于理性的追问必然会对神话叙事的发展和虚构性叙事造成阻碍。

对于中国早期故事诗的缺乏,胡适认为中国先民“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③,他将后来的南方作品《楚辞》与北方作品《诗经》对比,认为南方文学里的神迹和想象力比北方的要丰富,以此证明他的地域影响说,他的说法与鲁迅所引地理影响的说法大致相似。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最终担当起中国早期叙事功能的是史传作品。先秦文学中《尚书》、《春秋》等史书初步彰显了叙事文学的特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则进一步推进了叙事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左传》,被后人称为先秦叙事艺术的高峰,唐代刘知几称《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④。《左传》叙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②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③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④《载言》,(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二,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事详略得当,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能利用白描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长于将史实的记录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历史记叙故事化。早期的历史著作大抵都有文史哲兼通的特质,《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且有一定的哲学意味。汉史之后,文、史分流,史书中的文学性逐渐减弱,史家们一方面限于才力,另一方面限于史书客观写实的体例需要,在史书撰写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对文学性的追求,后世史书的叙事特征总体上看也不如早期史书显著。然而我国特定的纪传体传统,注定了史书是以人事为中心的,既要叙人写事,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叙事艺术。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正也。”^①这一说法其实早已言明史著的叙事特征。

汉代文学中,史书是集大成的文学样式,它渊源于先秦的历史散文,又吸收了哲理散文的精华,更融汇当时的文体——汉大赋,《史记》、《汉书》分别代表着西汉、东汉两个时代叙事艺术的最高峰,研究它们的叙事艺术和叙事特征,是研究其文学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叙事”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就已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字中,“叙”与“序”相通,“叙事”往往也写成“序事”。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②;《三国志·魏书十三》云:“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③;刘知几《史通》中列出了《叙事》一节,极力强调史书的叙事功能;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云:“按叙事起于古史官,其体有二:有纪一代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今滕》《顾命》是也,后世志记之属似之。又有纪一人之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六卷,第三篇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②(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卷六十二,第9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③(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卷十三,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8页。

始终,则先秦盖未之有,而昉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①中国史官制度的建制历时久远,源远流长。“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②综上所述可知,传统的“叙事”主要是指对事件的叙述,是以史传文为主的,史传文可说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的代表。中国的叙事研究即以中国文本为主的叙事研究以及对传统叙事理论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郑鹤声的《史汉研究》是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史》、《汉》研究专著,此书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它对前人研究或分类,或汇总,条理清晰,带有总结性质。“绪言”对汉魏以来的《史》、《汉》研究者及其研究专著作了罗列,他认为《史》、《汉》研究,“魏晋为盛,至唐而极矣,宋元以降,其流寝微”,故只列宋以前的《史》、《汉》注家。全书分为三章,依次是《史记》、《汉书》、《史汉比较》,前两章从“传略”、“组织”、“源流”、“条例”、“制作”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史记》一章中多了“补窜”一节,主要论及作者生平、作品成书情况、两书版本以及作品体例等,《汉书》一章中指出《汉书》有浮滥、矛盾、颠倒、暗惑等缺陷。第三章《史汉比较》认为“《史》、《汉》虽有同异,而各自成家者也”^③,对两书篇目异同以及文字异同等作了简略的比较,“《汉书》虽大致采用《史记》原文,然其间亦颇有损益之处,或取赞入传,或另取新材,大同小异,固非一端”^④。郑鹤声又指出《史记》好用俗字,《汉书》好用古字,对两书叙事语言的特色把握极为精准。总之,此书构架大致类似于现代专著,

①(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第6册,第1715页。

③郑鹤声《史汉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33页。

④《史汉研究》,第160页。

史料翔实,章目清晰,既有微观考证,又有宏观分析,将两书皆视为“天地间之奇文章”^①。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写于1942年,1946年由文光书店刊行,这本介绍古代典籍的小书共十三篇,“《史记》、《汉书》”是第九篇,对郑鹤声的《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多所参考。这本书严格上说来算不上一本学术著作,它面对的是大众读者,具普及性质,但是它对《史》、《汉》的研究和比较颇有值得注意之处:

《史记》、《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史》、《汉》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是大同的。^②

朱自清对两书在历代被推崇的情况作了简述,认为他们《史记》、《汉书》在叙事写人上大体是相同的,评价简明扼要。朱自清的《史》、《汉》研究相当客观,既有对前人观点的继承和纠偏,又有新的阐释和发现,他总结道:“《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③他将两书都推到了经典的地位,大力推崇,少有批判,也不简单以优劣论之。行文虽短,然见解精辟,对后来的研究多有启发。

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写于1946年,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书中以文学化的语言对司马迁的学术渊源、历史观点、政治观点以及《史记》的著作年代和文学风格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书并没对《史记》、《汉书》作比较,但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史记》之文学特征的专著,有必要在这里提及,而且《史记》的文学性系统研究走在《汉书》前面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史记》比《汉书》更具文学特征。

①《史汉研究》,第167页。

②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1页。

③《经典常谈》,第76页。

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由于政治气候的影响,有关两书的研究论著比较稀少。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两书的校点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30卷,自1959年初版以来,已多次重印,同样由中华书局校点的《汉书》,自1962年初版,经不断修正,也多次重印,成为优秀的读本。两书的校点刊行,为此后的《史》、《汉》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研究者是白寿彝,他就《司马迁与班固》同一个题目写了三篇文章,其中以《北京师范大学报》1963年第4期发表的最为全面,分十个专题,对传统的马班并举作了否定,认为无论从体裁还是史识上,班固都不能与司马迁相提并论。而原载于《人民日报》1964年1月23日第五版的《司马迁与班固》亦颇多创见,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前三部分讲司马迁和《史记》,后两个部分讲班固和《汉书》,创见颇多,肯定《史记》“于序事寓论断”的写法和它的历史进步性,也肯定了《汉书》的博洽,对其折衷主义则表示不满,将《汉书》对《史记》的改写视为“突出地体现了《史》、《汉》的对立,是有神论和无神论、永恒不变和不断变化之历史观的对立。总之,这是正宗史学和异端史学的对立”^①。批判相当尖锐,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1979年以后的《史》、《汉》研究进入新的阶段,随着学术风气的自由开放,研究者视野逐渐开阔,论述渐见系统,《史》、《汉》研究进一步深入,这一时期国内《史》、《汉》研究著作可以分为《史》、《汉》比较研究专著和《史》、《汉》各自研究状况两种。

(一)《史》、《汉》比较专著

施丁1980年定稿的《马班异同三论》长达十二万言,可视为一部专著。该文从历史编纂、史学思想、历史文学三方面对《史》、《汉》两书作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细致比较,既汇集前人评论,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分析相当细致。第三部分专论“马班历史文学之异同”,从“写历史人物”、“写战争”、“写人情世故”、“写历史环境”四方面比较两书的异同,施丁认为“司马迁是用画家的彩笔写历史……史篇是活生生的历

^①白寿彝《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司马迁与班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史；班固是用工细的墨笔写历史，因而在班固笔下，历史的账单较为清楚，然少彩色，有格式化的倾向”^①。他又说：“就历史散文来说，《汉》比《史》稍逊一筹。”^②文末有“马班异同之结论”，对两书异同及其原因作了概括和总结，得出“马《史》班《汉》的史学成就，各有千秋；然就思想而言，不能不说马高班低”^③的结论。施文论述相当全面，尤为可贵的是，它并不以人民性、阶级性评论两书高下，而是对两书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此文堪称《史》、《汉》比较研究史上的力著。

1984年徐朔方的《史汉论稿》亦是一部论班马异同的专书，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将《史》、《汉》研究论文汇集在一起，多为考证文章，下编对两书中重要传记的文字、段落异同作具体比较。其中上编《论〈汉书〉》一文较明确地对两书作了比较，并举例说明《汉书》对《史记》的承袭和删改有改好的，也有改坏的，作者认为“单从语言和修辞角度考虑……两者各有优劣，不可厚彼薄此”^④，“司马迁力求文史合一，即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史学著作的真实性合而为一。当两者不能兼顾时，有时他宁愿以文害史，而班固则相反”^⑤。此书总体而言，多为微观比较，论述非常到位，然缺点在较少宏观论述，因此其系统性不够强，但瑕不掩瑜。

韩国学者朴宰雨1994年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也不失为一佳作。此书主要从两书编撰体例上比较，第一章简略地回顾了《史》、《汉》两书的研究史、比较史，第二章为两书总体比较，主要是从作者写作背景、作者之精神体现、《汉书》对《史记》的承袭上来比较的。其中《汉书》对《史记》的承袭部分是用表格形式列出的，很下功夫。第三章为两书体例比较，是全书重点，也多用表格形式，逐

①施丁《司马迁研究新论·马班异同三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2页。

②《司马迁研究新论·马班异同三论》，第363页。

③《司马迁研究新论·马班异同三论》，第368页。

④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⑤《史汉论稿》，第36页。

篇分析两书文字增删以及繁简情况,让人一目了然。第四章为两书写作技巧比较。第五章为结论,简略说明全书架构和主要观点。此书主要从两书的编纂形式入手,较少进行艺术分析,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 考察《史》、《汉》异同,把握《汉书》各篇承袭《史记》之具体情况;2. 究明《史》、《汉》传记文在体例、传记形式、所传人物、文学成就上的异同得失。虽然书中也列出一章对两书艺术技巧进行分析,但其侧重点不在文学性和叙事性,而是注重《汉书》对《史记》的文字袭取情况,侧重情节异同之比对。因此,此书虽有资料上的参考价值,但在文章架构、艺术分析上参考价值不大。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此书的研究多有新颖别致之处,如表格的大量利用,体现出研究的严谨。此书以《史》、《汉》文本为基础,对两书异同进行比较,如《汉书》对《史记》的袭用情况部分,作者分七个方面来说明。在有关《史记》和《汉书》的大量专著与论文中,如此系统地罗列两书异同的仅此一书。总体看来,朴宰雨的侧重点在于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两书编撰形式进行比较,如关于两书的主角人物与附传人物,朴宰雨按篇目作了全部列举,这是此书的优胜处。第四章从布局、人物刻画、事件描写技巧、语言运用、主题呈现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两书的写作技巧,分析也有精到之处,没有流于一般的泛泛之论。对于《史记》、《汉书》的叙事技巧,他将之概括为:1. “上升法”、“渲染手法”;2. “对比法”、“对称法”;3. “插叙法”、“减轻法”;4. “悬疑手法”。这些叙事手法的概括主要受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一书的影响和启发。然而此书毕竟不是专门对两书的文学性进行比较的。对两书文学性进行系统比较的专著严格说来还没有出现,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并不多。因此,立足文本、从文学角度考察两书异同的研究便非常有必要。

(二)《史》、《汉》各自研究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呈现出百科全书式的面貌,成果突出的研究者有肖黎、张大可、俞樟华、张新科等,研究角度变化不一,有从历史观、战争观、美学观、经济观、人才观、史学观等多方面着手的。其中,综合性研究论著以1986年吴汝煜的《史记论稿》、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张大可《〈史记〉研究》、1994年张大可的《司马迁评

传》、1996年杨燕起的《〈史记〉的学术成就》、2000年赵生群的《〈史记〉文献学丛稿》、2001年陈桐生的《史魂：司马迁传》等著作为代表；专题性论著有1985年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1989年何世华的《〈史记〉美学论》、1989年覃启勋的《〈史记〉与日本文化》、1994年张大可的《司马迁评传》等，资料翔实，论述严密。一时间，《史记》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既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考证，如对司马迁生平、《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又多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从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在著作类型上看，既有传统的译注，如王利器《史记注译》、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等，各种选本、通俗读物空前繁荣；又有各种各样的现代索引，如1989年杨燕起、俞樟华合编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题要》、吴有文等编的《〈史记〉研究论著索引（1978—1998年9月）》等。《司马迁》电视连续剧、《百家讲坛》等各种关于司马迁的文史专题节目也不断搬上荧屏，满足观众的要求。此外，还出现了总结性质的综述，像张大可、郑之洪的《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陈桐生的《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曹晋的《〈史记〉百年文学研究述评》，奚可桢的《建国以来〈史记〉研究书目总略》、杨海峥的《汉唐〈史记〉研究论稿》及俞樟华、张新科的《史记研究史略》、《史记研究集成》、《〈建国以来〈史记〉研究书目总略〉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于《史记》的文学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不少专著和论文注意从《史记》的语言、人物、取材、心理描写、修辞艺术、戏剧性手法、叙事艺术以及用典等文学因素上分析考察，代表性的论著有1984年刘松来的《〈史记〉“互见法”初探》、1988年施伟忠的《〈史记〉心理描写探讨》、1989年杨树增的《〈史记〉艺术略论》、1993年张家英的《〈史记〉中的数词》、1998年江秀玲的《〈史记〉修辞艺术探微》、1995年张新科的《史记与中国文学》、2001年可永雪的《〈史记〉文学成就论说》、2002年俞樟华的《〈史记〉艺术论》、2004年杨树增的《史记艺术研究》等。

有关《史记》叙事学的研究专著有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刘宁博士的

《〈史记〉叙事学研究》一书,此书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点、叙事情节、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接受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作者花了较长的篇幅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进行论述,在分析作品时,往往将《史记》的叙事手法与先秦史著作比较。在写作中她大量引用西方叙事理论,如叙事视点一章,作者从叙事者、叙事立场、叙事角度以及聚焦、盲点等方面对《史记》的叙事进行分析;叙事话语一章中作者对叙事话语的外语境、内语境、叙事话语模式以及复调等作了比较详尽的阐发。总体上看,作者运用的是西方叙事学理论,但是有些地方如叙事立场、叙事情节等在剥掉理论术语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研究内核与其他《史记》研究专著并无太大区别。而且此书主要针对《史记》的叙事学以及此前的叙事作品,对《汉书》的叙事完全没有涉及。

《汉书》专著研究屈指可数,主要有1955年杨树达的《汉书窥管》、1959年陈直的《汉书新证》,两书分别于1984年和1979年再版;也有索引,如1979年魏连科编的《〈汉书〉人名索引》、1980年陈家麟、王仁康编的《〈汉书〉地名索引》、1988年王利器、王贞珉的《〈汉书〉古今人表疏证》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汉书》注释本和选本,如1983年吴恂的《〈汉书〉注商》、1990年马晓斌译注的《〈汉书·艺文志〉序译注》等,文学性研究专著几乎没有,只有单篇论文论及,研究角度也不及《史记》研究宽广。2005年汪耀明的《挥笔传神:〈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写人艺术谈》一书专注于前四史的写人艺术,并非专门的《汉书》研究。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潘定武的毕业论文《〈汉书〉文学研究》,于2008年略作修改,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汉书〉文学论稿》。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目前为止第一部对《汉书》文学作系统研究的专著。书中有一章“《汉书》的叙事艺术”,对《汉书》的叙事视角、时空特色、叙事内容、叙事类型等都有论述,他将《汉书》的叙事类型分为概括性叙事、呈线性叙事、以叙为议等三种。作者对于西方叙事理论并不像刘宁那样过多探讨,而是直接借用这些概念,以《汉书》中大量的例子说明,因此,这部论著总体上看写得清晰明净,以文本阅读为基础,不过多纠缠理论。诚如作者在“序论”中所说:“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前代历史散文特别是《史记》对《汉书》的影响力,更不必讳言

《史记》巨大的文学成就实令《汉书》及后世一切史著无法超越,但同样要认识到《汉书》自身的独特存在,而且要认识到《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乃是扭转《汉书》文学研究现状的根本前提。其实,《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不在对《史记》的模仿与步趋,而在体现时代与个性特色的创新。”^①正是本着这个基本认识,作者对《汉书》的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并时有新论,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汉书》文学特征的专著,其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据笔者从中国期刊网上的检索情况看,1979年到2000年的《史记》研究论文有1861篇,《汉书》的研究相对而言,就要逊色得多,不惟专著极少,连研究论文也不多见,中国期刊网上1979年到2000年的《汉书》研究论文仅459篇,大约为《史记》研究总数的四分之一。

从叙事学角度看,大部分《史记》研究专著都有关于《史记》叙事艺术的研究,但并不结合西方叙事学理论。如可永雪的《〈史记〉文学成就论说》中专列了“《史记》的叙事艺术”一章,作者着眼于传统的叙事理论,对《史记》的文章章法、结构艺术、场面描写做了详细的分析,他将《史记》的结构方式总结为十种:串珠式、板块式、岗峦起伏式、双线复调式、一二人物贯穿式、纠结麻花式、两两对比式、并列分叙式、横截编组式、网络式等等,这些结构方式的命名很明显是作者以传统叙事理论为基础,加以己见概括而成的。

中国期刊网上,以《史记》“叙事”或“叙述”命题的论文大约有三十余篇。^②作者刘宁有关《史记》叙事的论文基本上来自于她的博士论文。还有从研究著作看《史记》的叙事研究的,如范文静的《试论〈史记》

^①潘定武《汉书文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注:较重要的学术论文有王增恂的《〈史记〉叙事人问题和时空问题——从西方叙事学理论看〈史记〉的文学价值》;纪丽真的《〈史记〉的叙事话语:追求和创造整体艺术效果》;张宏军的《〈史记〉叙事法中的虚拟性特征》;陈曦的《〈史记〉隐含叙事探索》;刘宁的《〈史记〉的叙事结构》;唐子恒的《〈史记〉叙事的矛盾与夸张》;高萍的《〈史记〉人物传记叙事时间模式研究》;纪丽真的《特异性追求:〈史记〉叙事策略》;刘卫华的《〈史记〉中的预叙及其叙事效果》;等等。

菁华录》关于〈史记〉叙事时间的评点》^①。有关《汉书》叙事的研究论文则一篇也没有。

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叙事学的借鉴主要着眼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话语等几个方面,这些研究一般都能紧密结合《史记》本身的叙事特征,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也有一些文章主要讨论《史记》“实录”的叙事思想(特征)。《史记》叙事学研究的论文虽然不在少数,但相对来说比较琐碎,缺乏系统性,有关《汉书》的叙事学研究更是匮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以归结为人们对《汉书》的关注度不如《史记》,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西方叙事学并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史传叙事作品,可资借鉴的主要是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概念。

海外《史记》、《汉书》以在日本流传和研究最多。日本第一部书面文学集《怀风藻》约于公元751年编撰,其中第九十一首诗《悲不遇》开头:“贤者怀年暮,明君冀日新;周日载逸老,殷梦得伊人”之“殷梦得伊人”句就运用了《史记·殷本纪》的典故,而同一首诗中又有“南冠劳楚奏,北节倦胡尘;学类东方朔,年余朱买臣。”“北节倦胡尘”事见于《汉书·苏武传》,“东方朔”、“朱买臣”是《汉书》中首创的人物传记。这是《史记》、《汉书》渗入日本古代文学的最早记载,也是《史记》、《汉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史记》、《汉书》大约于八世纪初传入日本,八世纪末,菅野真道《续日本记》中已有“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的记载,此后,有关《史》、《汉》的研究著作也逐一传入日本。九世纪末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录》中“正史部”第十一就有裴驷集解《史记》八十卷,梁邹诞生撰《史记音》三卷、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廿卷,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卅卷,《史记新论》五卷旃蒙,无名氏《太史公史记问》一卷等;有关于《汉书》的有应劭集解《汉书》百十五卷,颜师古注《汉书》百廿卷,隋萧该《汉书音义》十二卷,隋包恺《汉书音》十二卷,陈姚察《汉书训纂》卅卷,无名氏之《汉书音义》三卷,

^①范文静《试论〈史记菁华录〉关于〈史记〉叙事时间的评点》,《考试周刊》2009年第45期。

颜师古之《汉书音义》，龙胤《汉书古今集义》廿卷，沈遵行《汉书问答》十卷，颜师古《汉书序例》一卷，无名氏《汉书赞》九卷，无名氏《汉书私记》七卷，等等。从此书所录日本所见之有关《史》、《汉》书目也可看出，八世纪之前《史记》研究者不如《汉书》多。现今日本所存《史》、《汉》版本众多，前面所提及的版本在日本大部分都有保存。^①

日本有关《史记》的研究成果众多，藤田胜久的《近年来日本的〈史记〉研究》^②一文简单地介绍了日本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可知日本对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的总论以及各种体例都有研究。此外，日本有关《史记》的专著也不少，比较出色的有思田仲任的《史记考》、村尾元融的《读史记稿本》，皆川愿的《史记戾柁》，中井积德的《史记雕题》，古贺昱的《史记匡谬》，僧瑞仙的《史记抄》，僧寿桂的《史记抄》，冈本保存的《史记传本考》、藤田胜久的《〈史记〉战国史料研究》等，其最佳者为日本泷川资言之《史记会注考证》，此书1934年行世，集中日历代《史记》注释研究之大成，作者用力之勤令中国学者们汗颜，直至今日，此书仍是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日本《汉书》研究大略有松平定信的《汉书论说》、冈本况斋的《汉书考文》、《续汉书考文》、《汉书律历志图志解》、《汉书笔记》、《汉书注引用书目》、能田忠亮、藪内清的《汉书律历志的研究》等，此外，还有部分译注，如内田智雄的《汉书刑法志》、黑羽英男的《汉书食货志志译注》、狩野直禎、西胁常记的《汉书郊祀志》，等等。

安徽社会科学院陈友冰先生在其《日本近百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相关特征》一文中指出：“在日本，《汉书》的影响要比《史记》大，说起来原因似乎很荒唐：日本流传的《史记》注疏本主要是裴駰的集解本，《汉书》则是颜师古的注本。颜注无论从学术影响或是训诂方面的功力，自然非裴駰可比，爱屋及乌，对《汉书》的重视自然也就超过《史

^①详情可见严绍盪教授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②藤田胜久《近年来日本的〈史记〉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5期

记》,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对考据和笺注的重视。”^①由于国内有关日本研究书目大部分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书,甚至连他们的研究状况也没能全面地了解,因此,对于日本《汉书》影响是否真比《史记》大,以及是否真是只因为对注释的重视而导致此现象,笔者都无置喙余地,故暂时存疑。

要之,《史》、《汉》研究在文献整理、文本考证、史实研究、文献综述等方面成果颇丰,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1. 观点重复。有关司马迁、班固的史学观点阐述过多,造成不必要的重复论述。

2. 引用材料单调。大多数论著只注重重点作品的分析,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货殖传》、《信陵君列传》、《苏武传》等,对两书中项羽、刘邦的比较分析尤为见重,甚至举例必举鸿门宴,对此外的绝大多数篇章较少论及。

3. 文学性研究视野狭窄。大致不外乎互见法、讽刺艺术、人物形象、语言艺术等几个方面,内容多雷同,创见不太多。

在对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一边倒的学术氛围中,打破目前文学研究狭隘局面,最重要的办法是立足文本,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加强对两书叙事的认识,这一点古代学者尤其是明清学者做得比较到位,他们通过对《史》、《汉》文本逐字评阅、圈点、考证,总结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叙事手法。对《史》、《汉》的比较研究,他们也有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因此,要想对《史》、《汉》进行系统研究,不能不全面掌握传统学者的《史》、《汉》研究状况。只有将文本阅读和前人研究相结合,同时广泛吸收古今中外文学理论,才能最大可能地贴近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原生态研究,因此,本书专设“《史记》《汉书》研究史”一编。

三、研究意义和主要研究方法

刘知几曾说:“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

^①陈友冰《日本近百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相关特征》,《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